

20 世纪 50 年代赴内地西藏地方 代表团概述^①

孙师文 程早霞

[摘要]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展了“组织上层人士赴内地参观考察”的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二十余批、千余人次于 20 世纪 50 年代赴祖国内地参观访问,呈现出组织安排团结统一、接待工作平等尊重、反帝爱国教育引导等显著特点。在西藏改革发展工作不同阶段条件下,各支西藏地方代表团的参观考察关注点亦有所区别,故其参观考察内容的具体部署、中央领导与之谈话的核心要点亦随之调整完善,以保证精准解答不同历史时期上层人士的所思所虑。西藏民主改革前 8 年,“组织上层人士赴内地参观考察”促进了西藏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保障了西藏社会进步发展的内外联动,是服务于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步走行稳致远的好方式。

[关键词] 反帝爱国统一战线;西藏上层;内地参观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 (X) (2022) 05-0144-10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观点与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客观实际相结合,扬弃继承了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形成的自上至下、形式多样的走访沟通传统,创造性地开展了“组织上层人士赴内地参观考察”(以下简称“内地参观”)的统战工作实践。1952—1957 年间各支西藏地方代表团(以下简称“各西藏团”)的成员几乎都是西藏地方有影响的上层贵族,实地接触和感受让他们开阔了视野,增进了对内地的感性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祖国内地、对新中国的认同。^② 组织上层参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引导西藏领导人员乃至整个上层集团的重要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故相关研究具有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西方知识精英对中国西藏认知历史研究”(项目编号:20&ZD238)阶段性成果。

^② 张云:《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治理西藏的伟大实践——从执行“十七条协议”到实行民主改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18 页。

极强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藏学界即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梳理论述,并取得了一定成果,^①但一些基础问题仍待校正明确,历史事实仍需挖掘整理,在与“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步走”基本观点的联系上尚存有空白。

一、1952—1957年间各西藏团体现的共性特点

1952年春,西藏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定扭转,伪“人民会议”事件和平解决、十世班禅顺利返藏、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方针确立,组织上层参观具备了由“受邀”向“主动”、自“游览”向“考察”转变的现实可能性。组织上层参观成为“调整民族关系,消除民族隔阂,促进各民族相互了解信任”的一种重要上层统战工作方法。^②在中央与西藏工委的计划安排下,西藏地区(不含昌都地区)^③自1952年8月至1957年9月间,共组织了二十余批、千余人次到祖国内地(详见附录一)。相较于同时期其他地区代表团而言,各西藏团所受限制更少^④;相较于同时期其他民族代表团而言,则呈现出更具规模、更为频繁、参观人次更多的特点。^⑤1954年12月,康藏、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交通的历史,彻底打破了西藏长期以来的封闭状态。随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各西藏团的规模较之过往更大,人员组成较之过往更为多元,“包括了西藏各地的僧俗官员,寺庙的活佛,格西,各宗、谿、里的负责头人和富裕农民等”,呈现出“社会地位高低不一,代表性较广泛,情况比较复杂”的特点。^⑥

(一) 团结统一:各西藏团由达赖、班禅两方面共同组成

1952年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达赖方面主动向张经武代表提出(后经西藏工委、军区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安排),愿组建一支以向毛主席致敬之名义,由西藏地方政府高级代表组成的西藏致敬团(柳霞·土登塔巴任团长、丁甲·多吉坚赞任副团长)前赴北京^⑦;在日喀则分工委的组织安排下,班禅方面也决定成立一支致敬团(丹巴日杰任团长)前往北京。为进一步增进西藏民族内部团结,

^① 相关研究内容较多地体现于阴法唐、徐淡庐、陈竞波、张向明等老同志,以及拉鲁·次旺多吉、唐麦·贡觉白姆、夏扎·甘丹班觉等上层人士的回忆文章中。从近15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以《解放西藏史》(2008年)、《西藏通史·当代卷》(2016年)两部著述围绕内地参观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且被学界广泛引述,研究呈现出更为具体的显著特点,并特别介绍了1952年柳霞所率致敬团的部分情况。

^② 江平、黄铸等:《怀念汪锋》,《民族团结》2000年第3期,第22页。

^③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实体。即便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也仅仅是在形式上统一了噶厦、堪厅委员会、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并未改变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实体同时并存的局面。统一战线性质政治实体昌都解放委员会区别于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噶厦及班禅堪厅,故所派出代表团在性质、目的、人员等方面皆存有明显差异。另从当时《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看,昌都地区代表团与达赖、班禅派出代表团始终相提并论,如1952年12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的标题是《西藏致敬团和昌都藏族国庆节观礼代表团的代表们盛赞东北和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故昌都地区代表团与西藏噶厦或班禅堪厅所派代表团是有区别的,不宜混谈。

^④ 《关于到各厂矿参观的试行办法》1954年3月18日、《规定各地机关、学校、团体、公私企业赴东北参观办法》1954年10月12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到各厂矿参观办法的指示(1954.3.5—8.1)》,全宗号:34,目录号:6,卷号:524,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⑤ 《1955年接待省外各民族参观团工作总结》,《黑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中央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指示精神,组织了各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全国各大城市参观活动的专卷(1956年4月)》,卷号:161,目录号:2,案卷号:1,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⑥ 《关于1956年参观团赴各地参观的通知》,编号:002-020-00769-008,北京市档案馆藏。

^⑦ 徐淡庐:《高原日记摘抄(续三)》,《西藏党史通讯》1988年第2期,第44、45页。

两支致敬团在中央指示下,于印度加尔各答合二为一,并沿用“西藏致敬团”名义(柳霞任团长,丹巴日杰任第一副团长、丁甲任第二副团长)。^①“合并重组”的1952年西藏致敬团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加强西藏内部团结认同”的关键步骤,“达赖、班禅两方面共同组成统一的西藏地方代表团,普遍由达赖代表任团长,班禅代表任副团长”的组织原则自此确立。“达赖第一、班禅第二,达赖为正、班禅为副”。1954年8月,中央就达赖、班禅联袂赴内地期间的招待、宣传工作作出指示,着重指出了达赖、班禅间隔阂猜忌的客观情况,明确以文件的形式规定了达赖与班禅间应坚持“达赖第一、班禅第二,达赖为正,班禅为副”的原则。^②在京期间,达赖、班禅相互看望、增进友谊,共同谒见了毛主席、聆听了亲切教导;共同莅视了中国佛教协会;共同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闭幕式;共同登上了天安门检阅台观礼国庆五周年庆典;共同参观了苏联展览馆和中央民族学院;共同参加了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访华等活动。在京活动结束后,达赖、班禅先后于1955年1月31日、2月1日抵达沈阳,开始对我国东北各主要城市的联袂考察。在哈尔滨市期间,达赖、班禅及其亲属、经师、亲信官员共居同一寓所,相互拜访、朝夕相处。在参观市容市貌、厂矿企业、名胜景点时,达赖、班禅及其所属四品以上僧俗官员同路而行、交流观感,产生了“促进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积极效果。^③

(二) 平等尊重:充分热情的接待工作彰显党的民族政策

细致、周到、耐心、热忱的接待工作,使注重礼节的西藏上层人士深感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尊重及高度重视。以1954年接待达赖、班禅的准备部署为例,1954年8月,中央专门围绕接待纪律、接待工作、宗教信仰、参观工作、其他方面等5项提出了应注意的规范要求,强调了接待达赖、班禅及其随同西藏僧俗官员的重大政治意义。^④以达赖、班禅联袂参观走访哈尔滨时的接待实际来看,在住宿生活方面,特选定了毛主席曾居住过的别墅作为达赖、班禅的寓所,并根据藏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重新进行了装修布置;在文娱活动方面,专门组织安排了3场晚会,并特别为达赖、班禅准备了冰上运动表演;在参观考察方面,凡是其希望了解的、愿意看到的,都一一得到了满足。^⑤充分热情的接待工作使上层人士深刻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萌生了“我们到每个地方参观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由于是亲兄弟般的关系,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相处都很融洽”^⑥的真挚情感。率团赴内地考察的西藏僧俗上层人士普遍受到过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谈话内容涉及国家大事、西藏工作、宗教信仰等各个领域,帮助他们卸下了西藏社会尚存的中国共产党“扑灭佛法”的思想包袱,清晰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态度,以及对宗教信仰一律加以保护的决心。

① 徐淡庐:《高原日记摘抄(续完)》,《西藏党史通讯》1988年第3期,第33页。

②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77页。

③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哈市活动日程细则》,《省人委及哈市市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区参观团及宣传有关材料(1955.1.10—12.15)》,全宗号:34,目录号:7,卷号:85,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④ 《招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应遵守的纪律和应注意的事项》,《省人委及哈市市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区参观团及宣传有关材料(1955.1.10—12.15)》,全宗号:34,目录号:7,卷号:85,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⑤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来哈参观接待计划》1955年2月10日,《省人委及哈市市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区参观团及宣传有关材料(1955.1.10—12.15)》,全宗号:34,目录号:7,卷号:85,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⑥ 《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1955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

同时涉及上层人士所关心的私事^①，在与达赖的谈话中，回答了“达赖的哥哥（当才活佛）逃到国外不回来的问题”；在与班禅的谈话中，针对“返藏途中是否收礼的问题”作出了安排，真诚地将团结爱护工作做到了上层人士的心坎上。

（三）反帝爱国：英雄事迹教育引导下的认同感增强

“各西藏团”在祖国各地考察走访时，除了参观厂矿车间、游览风景名胜、走访寺院庙宇之外，普遍在陪同人员或当地的组织安排下，专程前往极具反帝爱国教育意义的各处历史遗迹、烈士陵园或纪念馆进行参观吊唁。各地负责接待的同志又分别结合本地革命斗争实际，向西藏上层人士介绍本地在反帝爱国方面的相关情况。例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领导在与达赖、班禅的谈话中，结合哈尔滨曾是北满统治中心、我党地下活动中心、东北解放战争后方基地的实际，详细介绍了赵一曼、李兆麟、赵尚志、杨靖宇等英雄的革命事迹。^②事实证明，专程前往极具反帝爱国教育意义的各处历史遗迹、烈士陵园或纪念馆进行参观吊唁的惯例，帮助西藏上层人士逐渐了解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欺凌奴役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认清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本质，激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正如1952年西藏致敬团第二副团长丁甲所说，东北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事迹，让他想起藏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祖国的历史，说明了帝国主义是我们祖国各民族的死敌。^③“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认知基础上，上层人士对于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亦因这一惯例而愈发增强。例如，拉鲁所率西藏参观团前往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吊唁后，参观团成员索朗木表示：“由于毛主席政策好，教育了全国人民，我们才出了这些英雄。”拉鲁则公开表达了对“毛主席英明领导、共产党伟大”的赞美之情，在留言簿上写道：“我们要继承先烈的壮志，努力的来建设我们的祖国，来报答烈士们。”^④

二、改革发展工作的阶段性特征于各西藏团参观考察中的体现

内地参观考察的实践，本质上是上层人士置身于一个开放交流的新环境之中，通过亲历、亲见、亲闻，使之脑海中固有的“污名化、妖魔化的党和国家形象”^⑤发生转变，树立对党和国家“安排好、不降低”改革承诺的坚定信心；使之认识到西藏社会前进发展的大趋势，逐渐赞同并接受中央提出的民主改革原则。西藏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以及上层人士不同时期的认识特点，决定

^① 《创造条件帮助西藏实现改革和进步》（1954年10月9日）、《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1955年3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09、124页。

^② 《省市首长谈话参考资料》，《省人委及哈市人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区参观团及宣传有关材料（1955.1.10—12.15）》，全宗号：34，目录号：7，卷号：85，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③ 《西藏致敬团和昌都藏族国庆节观礼代表团的代表们盛赞东北和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人民日报》1952年12月8日第1版。

^④ 《关于招待西藏地区参观团工作的总结报告》，《省人委及哈市人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区参观团及宣传有关材料（1955.1.10—12.15）》，全宗号：34，目录号：7，卷号：85，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⑤ 以档案资料为依据，考察分裂反动谣言蛊惑下的西藏上层人士“党和国家形象”认知，可发现：其一，对赴内地参观感到恐惧，担心参观结束后无法返回西藏；其二，对祖国内地抱有偏见，如上海被描述为“流氓小贼多”的城市；其三，对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丑化认识，如新中国生产的白糖被污蔑为“内有人头骨、猪油等物”。《关于招待西藏地区参观团工作的总结报告》，《省人委及哈市人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区参观团及宣传有关材料（1955.1.10—12.15）》，全宗号：34，目录号：7，卷号：85，黑龙江省档案馆藏；《青年团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西藏第三届青年参观团报告的简报》，编号：C23-2-101-156，上海市档案馆藏。

了其在“西藏现代化与民主改革问题”上的思想认识将经历“否定之否定”发展过程,这意味着不同历史阶段的组织上层参观的重点内容以及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与其谈话的核心内容,必将随之适应调整。如此,方能帮助上层人士积累认识上的量变,并进一步引导上层人士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一) 和平解放初期,在对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受反动分裂势力蓄意破坏影响,西藏部分上层人士对《十七条协议》所规定的部分内容存有因误解而产生的抵触情绪。加之新疆、青海、内蒙古等民族地区相继广泛开展的“减租减息”及土地改革运动的消息传至西藏后,造成上层人士开始担心中国共产党未来“对贵族能否给予像现在一样的待遇?政策是否像生皮做的帽子越来越紧?”^①因此,1952年8月至1954年6月期间各西藏团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考察《十七条协议》所规定的“不予变更、不加强迫”的承诺是否真诚、是否将会被一以贯之地执行,以及各民族地区、各寺院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及改革后的实际情况。其间,以1952年柳霞所率西藏致敬团、1953年朵噶·彭措饶杰所率西藏国庆观礼团最具影响及代表性。

在与柳霞、彭措饶杰等上层人士的谈话中,毛主席指出“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十七条协议》中规定的内容,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立足于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帮助西藏建设的视角,毛主席将西藏全面执行协议内容的时间表从当下调整到了未来的某个时间,“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多的帮助”。在此基础上,毛主席将西藏的改革发展工作赋予了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既着重强调了“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的原则,又反复申明了西藏地区各项工作“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的方针。^②毛主席的谈话既表明中央坚决等候时机的鲜明态度,同时最大限度安抚了上层人士情绪、最大程度争取了上层人士支持。

柳霞、彭措饶杰分别率团先后参观走访了内蒙古、青海等历史上与西藏有着密切联系的民族地区,以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和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等地,特详细考察了土地改革运动在民族地区的实际落实情况,见证了当地少数民族“人畜两旺”的幸福生活^③,实地验证了“自治区的干部大部分由本民族人担任,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工作场景^④;参观走访了土地改革运动后的甘珠寺、塔尔寺等多地多座寺庙,看到寺院的土地得到了保护,活佛的地位丝毫未变,僧人们生活日益富裕^⑤。在与喜饶嘉措大师的亲切谈话过程中,彭措饶杰发出了“党的民族政策是确实为人民的”赞许^⑥;参观走访了哈尔滨、上海、天津等城市,考察了民营工商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得到的恢复与发展,看到了资本家在政治上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权利。柳霞表示:西藏上层中盛传的“共产党没收私人资本”谣言不攻自破。^⑦

① 夏扎·甘丹班觉:《甘丹夏扎家族史概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II),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08—509页。

② 《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的谈话要点》(1952年10月8日)、《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1953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89、90、102、103页。

③ 《西藏致敬团等赴哈尔滨》,《人民日报》1952年11月21日第1版。

④ 《西藏国庆观礼团团长沙朵噶·彭措饶杰向西藏僧俗官员、人民广播》,《人民日报》1954年6月29日第3版。

⑤ 《西藏致敬团访西北后回北京》,《人民日报》1953年2月3日第1版。

⑥ 王富荣:《朵噶·彭措饶杰中将与毛泽东的一篇文稿》,《军事历史》2002年第1期,第67页。

⑦ 《西藏致敬团团长柳霞·土登塔巴向西藏人民广播参观祖国各地的观感》,《人民日报》1953年4月11日第3版。

(二) 在更为积极有利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认识良性发展共同作用下, 西藏在《十七条协议》的初步落实工作中取得了一批显著成就。1954 年 10 月, 阿沛在与计晋美的谈话中提出了“根据我们脑壳的大小制一顶恰好的帽子”^①的合作主张; 达赖则主动明确地表达了“在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 不断地提高”的积极愿望。^②因此, 在 1954 年 8 月至 1955 年 6 月期间各西藏团的注意力, 更多地集中于考察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日新月异以及前途的无限光明。其间, 以 1954 年达赖、班禅联袂或分别率队的两支参观团最具影响及代表性。

1954 年 10 月 12 日, 柳震向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提交了达赖方面拟定的参观计划, 特别提及希望赴“东北、上海等各大城市参观”^③。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安排下, 自 1954 年 12 月 13 日至 1955 年 2 月 23 日, 达赖、班禅既有联袂行程, 又有分别计划, 先后赴天津、南京、杭州、上海、沈阳、旅(顺)大(连)、哈尔滨等城市参观访问。从各地逗留时间、各处参观内容上看, 参观团更侧重于考察工业化较为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和地区, 所考察的工业门类则大多与西藏人民生活实际联系较为密切。在天津, 达赖、班禅重点参观了毛织厂和印染厂, 提出:“也可以试办一些规模较小的毛织业及皮革工厂和水力发电厂。有了一点工业, 才能改善人民生活。”^④在上海, 达赖详细考察上海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厂的车间生产过程, 听取新式自动换梭纺织机等设备的情况介绍; 认真参观江南造船厂钢铁结构车间, 观看工人使用巨型机器轧制钢材的过程; 专程走访上海机床厂车间, 实地了解厂内新产的新式磨床。^⑤在哈尔滨, 达赖、班禅对自动化的大型机械设备以及青年工人的熟练操作表现出浓厚兴趣, 对亚麻厂的产量感到惊讶, 对祖国能制造发电机、电动机等重要设备及量具、刃具等精密工具而感到自豪。针对西藏的实际情况, 达赖在电机厂认真了解发电机的相关情况, 班禅特地前往东北农学院畜牧场参观调研。^⑥

达赖因上海成为“由人民当家做主人的、以大批的人力和物力供应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城市, 而感到无限兴奋”^⑦。班禅更兴奋地向毛主席汇报, “在东北参观中, 看到了许多重工业的建设, 感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会很快地建设成, 感到无限的高兴”^⑧。“西藏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落后”的深刻感触下, 达赖承诺“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 真诚地互相帮助, 共同努力工作”^⑨; 班禅也公开表示“需要早些回去, 做更多的工作”^⑩。毛主席一面以释迦牟尼为众生解除受压迫的痛苦为例, 勉励达赖、班禅在参观考察后形成的进步观念; 一面特别叮嘱达赖、班禅“不要急, 慢慢地来……”“你

① 张定一:《1954 年达赖、班禅晋京记略——兼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184 页。

② 《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1955 年 2 月 23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 第 114 页。

③ 张定一:《1954 年达赖、班禅晋京记略——兼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第 137 页。

④ 同上, 第 151 页。

⑤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达赖喇嘛来沪参观》, 编号: H1-27-6、H1-27-7, 上海市档案馆藏。

⑥ 《接待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来哈尔滨市参观工作的总结报告》,《省人委及哈市人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区参观团及宣传有关材料(1955.1.10—12.15)》, 全宗号: 34, 目录号: 7, 卷号: 85,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⑦ 《达赖喇嘛离开上海 陈毅市长昨晚设宴欢送》,《文汇报》1955 年 1 月 29 日第 1 版。

⑧ 《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1955 年 2 月 23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 第 113 页。

⑨ 《同达赖喇嘛的谈话》(1955 年 3 月 8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 第 119 页。

⑩ 《班禅额尔德尼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 年 3 月 11 日第 1 版。

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和大家团结一致地搞工作,不能因在内地看到了一些建设发展情况而着急”^①。

(三) 民主改革在四川涉藏地区率先开展后,部分局限于自身阶级立场的西藏上层再次感到疑虑不安(在反动分裂分子的蛊惑、破坏下,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绪),开始顾虑民主改革何时改、如何改,以及改革后的个人前途等问题。正如拉鲁所言,“我认为改革以后好,但改成社会主义以后究竟怎么办,自己现在还想不出来”^②。因此,在1955年9月至1957年9月期间,各西藏团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考察中央对民主改革政策的态度,以及内地社会主义改造情况。其间,以1955年拉鲁所率西藏参观团、桑颇·登增顿珠所率西藏青年参观团最具影响及代表性。

1955年10月23日下午,毛主席借接见西藏参观团和西藏青年参观团之机,与拉鲁等上层人士进行了两小时的亲切谈话。^③毛主席以释迦牟尼为例指引上层人士正确认识民主改革目的,并明确表态:“改革要你们下决心……我们不能替你们下决心”;以新疆、内蒙古、延边等地的改革情况及汉族中“贵族”的生活情况为例,劝导上层不要害怕民主改革;针对上层人士所关心的生活待遇、个人前途、政治地位等方面作出了“还是照旧,不能改坏”的郑重承诺;给出了“上海有个大资本家叫荣毅仁,是我们汉人中的贵族,他现在准备搞社会主义,你们去和他谈一谈”的考察建议。^④实地考察后,两支参观团内部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认识分化。多数上层人士朴素表达了“这里工人多、生活好,西藏那里生活不好,到现在还点酥油灯”^⑤的羡慕与感慨,并流露出“人家进步很快,为什么别人不害怕呢?全国都是社会主义了,可我们中间还有人却还在往后拉”的进步愿望^⑥。但部分上层的“思想斗争仍较尖锐,顾虑较大,在态度上不够明朗”。上海方面为此特别提出“应当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问题上组织一些参观和座谈,适当解决团长及贵族的顾虑”的接待计划,专门安排西藏青年参观团前往公私合营的申九新厂、大中华橡胶厂实地考察调研。^⑦此外,部分上层人士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仍存有一定顾虑,表达了“今后西藏工业发展了,人们都到工厂去做工还不够,到那时寺庙里就没人当喇嘛了”^⑧的担忧与不安。

结合西藏参观团、西藏青年团在内地参观所取得的思想进步,以及仍旧存在的认识堵点,考虑到上层人士对四川甘孜地区民主改革的普遍关心,毛主席再次围绕“民主改革决定权、民主改革时机、民主改革办法”等问题与拉鲁等人进行了坦诚真挚的面对面沟通引导,再次重申了“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的鲜明态度。^⑨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以及在祖国内地

① 《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1955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14页。

② 《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等的谈话》(195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28—129页。

③ 《毛主席接见西藏两个参观团》,《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4日第1版。

④ 《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等的谈话》(195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27—133页。

⑤ 《西藏地区参观团活动简报》,《省人委及哈市人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区参观团及宣传有关材料(1955.1.10—12.15)》,全宗号:34,目录号:7,卷号:85,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⑥ 《青年团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西藏第三届青年参观团报告的简报》,编号:C23-2-101-156,上海市档案馆藏。

⑦ 《青年团上海市办公室关于接待西藏青年参观团工作计划(草案)》,编号:C23-2-101-145,上海市档案馆藏。

⑧ 《关于招待西藏地区参观团工作的总结报告》,《省人委及哈市人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区参观团及宣传有关材料(1955.1.10—12.15)》,全宗号:34,目录号:7,卷号:85,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⑨ 《同藏族人士的谈话》(1956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40—143页。

的参观见闻，由拉鲁等人带回西藏传达后，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上层人士的忧虑情绪，为中央代表团赴藏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创造了更为积极融洽的政治氛围，为西藏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服务于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步走行稳致远的好方式

西藏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内地反帝反封建同时进行的一般经验，呈现反帝和反封建两步走的特点：“第一步先反帝，暂不反封，首先把西藏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第二步为西藏劳动人民的阶级解放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时再反封，争取将他们从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①

西藏民主改革前8年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好、巩固好进军和经营西藏以来取得的政治统一成果，夯实西藏作为祖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事实基础。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反帝爱国的上层人士尚为少数，帝国主义扶植下的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势力仍相当强大。因此，在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取消外国特权的的同时，更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帮助绝大多数的西藏上层中间人士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围绕伪“人民会议”斗争的胜利，使许多西藏上层中间人士接受了反帝教育，改变了其原本的亲帝恐帝心理，在政治态度上开始向爱国势力靠拢。在此阶段性成果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主动地把握了上层人士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识需求，积极地组织上层人士出西藏、赴内地参观考察，引导上层人士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形势教育。具体来看，团结统一的组织安排、细致周到的热忱接待、反帝爱国的沉浸教育，使得各西藏团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亲密无间的有机联系，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全面纵深发展的同时，更增强了上层人士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以及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具体体会，“依靠祖国建设新西藏和热爱祖国的思想”日渐铸牢。^② 组织上层参观的统战工作方式，有助于上层人士自觉抵制对祖国的离心倾向、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教育引导了上层人士深刻认清敌我矛盾，主动站到反帝爱国立场上来，是促进西藏反帝爱国统一战线逐步形成的关键步骤。

帮助西藏农奴群众翻身解放，实现西藏“日月换新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根本任务。但和平解放前的西藏，是全国唯一没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省区。西藏群众长期受民族、宗教观念禁锢，加之环境闭塞，严重缺乏进步革命思想。因此，在西藏民主改革前8年，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坚持慎重稳进方针，还应保持足够的耐心，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需要在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旗帜下，教育和等待西藏领导人员乃至整个上层集团觉悟，并顺应西藏旧制度已然腐朽、新萌芽呼之欲出的历史必然，争取他们转变到人民立场上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为西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二步创造条件。但复杂独特的地理环境、封闭保守的心理因素，造成了旧西藏大多数的上层人士对西藏之外的情况了解不多、不深。在缺乏榜样参照比对的情况下，上层人士很难认识到自身所处封建农奴制度的落后衰败，更难对社会主义新西藏产生具体的憧憬向往。组织西藏上层参观是将上层人士置身于与祖国内地建立并保持密切的政治、

^①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藏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528页。

^② 《招待西藏参观团总结报告》，《黑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中央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指示精神，组织了各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全国各大城市参观活动的专卷（1956年4月）》，卷号：161，目录号：2，案卷号：1，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经济、文化吐纳关系中,从而帮助上层人士跨出小天地,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是保障西藏社会进步发展内外联动的重要契机。具体来看,现代化的城市建设、自动化的厂矿车间给上层人士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推动了西藏的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一批西藏地方重要官员因此成为讲述好、宣传好中央民主改革精神的代言人,以及保障好、推动好新西藏社会稳定发展的促进派。

《解放西藏史》一书中,针对“组织上层参观”的统战实践,提出了“两个好方式”的观点:“这既是他们(上层人士)了解中国共产党、认识祖国、加强民族团结的好方式,也是中央直接了解西藏情况,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团结西藏民族的好方式。”^①在此基础上,“组织上层参观”的统战实践,也是服务于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步走行稳致远的好方式。

附录一 各支西藏地区代表团概况表(1952—1957年)

编号	代表团名称	自拉萨出发时间	抵达北京时间	自京返藏时间	团长	第一副团长	毛主席接见时间
1	西藏参观团	1952年8月7日	1952年9月30日	1953年2月28日	欧系·土登桑却	门堆巴·洛桑旺堆	1952年10月8日
2	西藏致敬团	1952年8月21日	1952年9月30日	1953年2月28日、4月9日	柳霞·土登塔巴	丹巴日杰	1952年10月8日
3	西藏青年参观团	1953年3月3日	1953年6月7日		索康·喀洛旺觉	噶雪·敢异	1953年10月18日
4	西藏佛教代表团	1953年4月3日	1953年5月29日		功德林·晋美吉村活佛	兑炯·益西多吉活佛	1953年10月18日
5	西藏国庆观礼团	1953年8月3、6、17日	1953年9月28日	1954年6月28日	朵噶·彭措饶杰	纳旺金巴	1953年10月18日
6	达赖所率参观团	1954年7月15日	1954年9月4日	1955年3月12日	十四世达赖喇嘛		1954年9月11日、10月9日; 1955年2月24日、3月8日
7	班禅所率参观团	1954年7月16日	1954年9月4日	1955年3月12日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		1954年9月11日、10月10日; 1955年2月24日、3月9日
8	西藏国庆观礼团	1954年8月5日			索康·旺清格来		1954年10月25日
9	西藏歌舞团	1954年8月5日			雪康·索朗达杰		
10	西藏参观团	1954年8月5日	1954年9月29日	1955年3月28日	然巴·朗吉旺秋	何巴敦	1954年10月25日; 1955年2月12日
11	西藏参观团	1955年9月4日	1955年9月28日	1956年3月10日	拉鲁·次旺多吉	安庆·定结	1955年10月23日; 1956年2月12日
12	西藏青年参观团	1955年9月4日	1955年9月28日		桑颇·登增顿珠	才旺多登	1955年10月23日; 1956年2月12日
13	西藏体育观摩团	1956年3月15日	1956年4月27日		索康晋美		

^①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藏史》,第230页。

编号	代表团名称	自拉萨出发时间	抵达北京时间	自京返藏时间	团长	第一副团长	毛主席接见时间
14	西藏妇女参观团	1956 年 7 月 20 日	1956 年 8 月 23 日	1957 年 1 月 16 日	唐麦·贡觉白姆	才苏才羊	1956 年 8 月 27 日
15	西藏参观团	1956 年 9 月 6 日	1956 年 9 月 27 日		帕巴拉·格列朗杰(名誉) 桑颇·才旺仁增	夏孜·洛桑桑珠	1957 年 3 月 2 日
16	西藏青年参观团	1956 年 10 月 17 日		1957 年 5 月 13 日	平措旺秋	白玛生杰	1957 年 2 月 8 日、 3 月 2 日
17	西藏歌舞团	1956 年 12 月 25 日					
18	西藏妇女代表团	1957 年 5 月 17 日			仁钦卓玛		
19	西藏参观团	1957 年 7 月 12 日			土登桑布	扎什伦布寺季康堪布	
20	西藏青年参观团	1957 年 9 月 10 日					

注：本表以《人民日报》《文汇报》及《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中华通鉴·西藏卷》《毛泽东年谱》等资料中的相关内容为依据，对于其中存在争议的时间点，以《人民日报》记述为准。

[本文责任编辑 杜冰梅]

[作者简介] 孙师文，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哈尔滨 150009）；程早霞，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杭州 310058）。

Keywords: *Old Tibetan Annals*; Alliance; Convener; Verbs for alliance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sNgo vbum sman gyi gter mdzod* and Its Identification Theory of Medicinal Plants in Tibetan Medicine

Lha mo skyabs, Dran pa vtsho, Tshe ring

Abstract: The *sNgo vbum sman gyi gter mdzod* is a monograph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ibetan medicinal plants formed by collecting, sorting out,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materia medica of the past, appeared in the ‘Northern School’ of Tibetan medicine sometime around the middle-to-late 15th century. It not only inherits the advantages of materia medica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past ages, but also creatively puts forward eight morp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points and seve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dentification elements of Tibetan medicinal plants, and eleven nomenclatures of Tibetan medicin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research and identification practice of Tibetan medicinal plants. By comparing thre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text, it concludes the main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basic theory of Tibetan medicine, the nomenclature of Tibetan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their synonyms and homonyms,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Tibetan medicine, and so on.

Keywords: *sNgo vbum sman gyi gter mdzod*; Materia medica of Tibetan medicine; Tibetan medicinal plants

An Overview of the Delegation of Tibet to the Inland in the 1950s

SUN Shi-wen, CHENG Zao-xi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reatively carried out the united front work practice of “organizing the upper-class to visit the inland” since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In the 1950s, in total more than twenty batches, over a thousand people had been organized to visit the inland, featuring “unity, equality and respect, anti-imperialism and patriotism”.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ibet, the focuses of the Tibetan regional representative groups vary, therefore the specific deployment of the visit and the core points of the talks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aders were adjusted, guaranteeing the accuracy of the answers regarding the considerations of the upper-class of Tibe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In the first eight years of the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organizing the upper-class to visit the inland” ha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anti-imperialist and patriotic united front in Tibet, which has ensure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age of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n Tibet, acting as a good method for the two-ste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Tibet.

Keywords: Anti-imperialist and patriotic united front; The upper-class of Tibet; Visit the inland; New-demo-

cratic revolution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n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ject of "Separation of Human and Livestock"—Case Studies of Three Villages in Myang-chu Valley of Central Tibet

bKra lo

Abstract: When promoting the "Separation of Humans and Animals" project of the rural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ction in Myang-chu Valley in Tibet, it requi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entralized livestock breeding and advocates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cooperation. In this regard, the participation attitudes of villagers in different villages are differentiated. Through the case analysis of three typical villages,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attitude of the villagers is affected by three problems: firstly, whether the separation of human and livestock will lead to uneconomical problems due to rising labor costs; secondly, whether cooperative breeding will be caused by management; thirdly, whether the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industries is sufficient to make up for the problems that may be caused by cooperative farming. These problems are essentially related to the propor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household economic structure.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and smoothly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develop the rural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fitability of cooperatives and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of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cooperatives, develop multiple operations in villages to solve the transfer of non-core labor force, adhere to village-specific policies, and project promotion should maintain appropriate flexibility.

Keywords: Improvement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Rural areas in Tibet; "Separation of Humans and Animals"; Myang-chu Valley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est Distribution and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of Tibet on Its Central Task

lHo-rong dGra-vdul, GE Lin-ning, PENG He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data and the author's long-term field research accumulation, the article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latest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of Tibet, such as the horizontal, vertical, urban-rural and borderline distribution, and research on a connection with the central task of Tibet in the new era. Research.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specially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population of Tibet is gathering at an altitude of 3,500—4,000 meters, especially in large and medium cities and counties such as Lhasa and Shigatse. Given that the central cities and towns of Tibet are the areas where the various